

# 第十章 哀鸿遍野

黄水泛滥之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哪些补救措施？这些措施收效如何？逃荒路上发生了多少血泪交织、生离死别的故事？“释迦牟尼的救生船”能否使灾民到达苦海的彼岸？千百万背井离乡的灾民，为求活命怎样挣扎在苦难的深渊？

## 1. 政府赈济僧多粥少，民众捐款杯水车薪

黄河决堤造成大面积泛滥之后，国民党政府曾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1938年6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派全国赈济委员会副会长屈映光到洛阳主持黄灾抚赈事宜。屈映光于6月23日从武汉抵达洛阳后，便着手开展救济工作，于郑州、洛阳两地设立了“特派办理黄灾抚赈事宜办事处”，组织人事，制订方案，将救济工作着重放在安抚、急赈、收容、编配、生产五个方面。

屈映光先率员前往黄泛区视察，派人到重灾区发放急赈，电告当地政府，要求其赶制船筏，救援被黄水围困的灾民。同时通知平汉路郑州以南、陇海路郑州以西沿线及平汉路以西、陇海路以南地区各县市，立即设立收容所，收容因遭受水灾兵燹而流离失所的难民。随后，他又带人沿陇海路西段勘察移民屯垦区域，确定将豫西的邓县、唐河、桐柏、新野以及陕西的宝鸡、安康、黄龙山等地作为移植灾民的区域。地处陕西东部的黄龙山，方圆数百里，是移民的重点地区，赈委会初步拟定计划，向该地移植灾民10万。实施这项计划，预计需经费600余万元。

国民党中央除派员在河南设立专门救灾机构外，又发起黄灾救济捐款一日运动，通令各级党部与各地机关团体进行募捐救灾。并发表《告党员民众书》如下：

海内外各级党部并转各地同志各地同胞均鉴：

溯自日寇侵华以来，首都沦陷，各地城市农村悉遭敌人破坏横加占领或沦为战区者共十五省。全国被难同胞在沦陷区内者超过一千万。幸而迁避后方者约一千余万，亦均流离失所。此次日寇侵豫，复酿成黄河决口，以致豫东豫北洪水横流，二十五县几成泽国，庐舍为墟，桑田成海，被灾区域广约一千余公方里（平方公里），被难同胞又增多百数十万。兵灾水患，交迫兼逼。敌人以为借此足以困我。讵

我忍痛耐苦，敌忾同仇，抗战建国之志愈益坚强，惟救济难民，抚慰伤亡，为抗战建国急要之图。中央对于一般伤兵难民，自抗战以来，即已分别筹有办法，力谋救济，此次黄河决口，灾情特别重大，尤殷轸念，故已专案决定，在黄灾区内，不分被兵被水，急施赈抚。并由国府责成赈济委员会妥速办理。灾区辽阔，难民众多，政府独立主持，收效难期普及，爰再发起黄灾救济赈款一日运动，妥订募捐办法，并先由中央党部捐款十万元，以为之倡。切盼各地同志各地同胞本互助之精神，推衣解食，踊跃输将，尽全国一日之人力物力，必足以出百数十万被难同胞于水火，而登之衽席，幸我各地同志各地同胞急起图之，被难同胞幸甚，抗战建国幸甚。

《告党员民众书》后面，还附了举行黄灾救济捐款一日运动的办法：

一、全国各地应于7月以内指定一日为救济黄灾募捐日；二、救济黄灾募捐日详细办法，由各地省市党部及特别党部会同各机关团体会商拟定施行，并须呈报中央备案；三、各地党部应于举行救济黄灾募捐日以前，尽量宣传救济黄灾之意义。所有宣传及办公费用应由党政各机关分担，不得动用捐款；四、各地捐款应指定银行经收，径行汇解中央赈济委员会，统筹分配；五、各地捐款应于举行救济黄灾募捐日后三日内由经收银行汇解，同时由各地党部将办理经过捐款总数报告中央备案；六、募捐结束后，各地党部应编制征信录，连同赈济委员会收据，在当地报纸公布，以昭大信。

国民党中央倡导开展救济黄灾募捐运动后，后方各级党部相继成立了“黄灾救济一日捐款运动委员会”，组织宣传动员和劝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武汉，湖北省黄灾救委会召集青年行动队和童子军，组成五十个宣传队、十五个劝募队分赴武汉各轮渡码头、公共场所，一面宣传，一面劝募。同时规定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及各商店、工厂店员职工，最低限度，捐献一日之收入。自由职业者及各公司行号业主自由乐捐。一般民众，则由各保甲挨户劝导捐款。募捐款由《武汉日报》、《大公报》、《扫荡报》、《新华日报》等报社代收，然后汇解中央银行。

在广州，来自妇女联合会服务团、童子军、少年团以及各救亡团体和学校的两千多名男女青少年，于募捐日到各街衢闹市、公共场所劝销“黄灾救济纪念章”，募集捐款。此日，上午烈日当空，下午风雨大作，但两千余名青少年始终热情高涨，坚持进行募捐活动。

在郑州、洛阳、西安、兰州、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均开展了黄灾救济捐款一



236

日运动。

在国民党中央号召开展黄灾救济募捐的同时，一些文艺界名流纷纷在大城市进行赈灾义演。一些地方富绅也慷慨解囊，向赈济委员会捐款。

此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又发动民众，在花园口口门处筑坝，以减少水量。并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耗资240万元，动用50万人工，自花园口至周家口修筑一道长达500余华里的新堤，以限制黄水泛滥。

河南省党部为策动全省救济灾民工作，还拟定了《各县党部办理救济难民保育难童实施暂行办法九条》，规定为各党部的考成项目，以期赈济救灾工作在各县乡村得到落实。

国民党行政院同时饬令交通部门，给输送难民的车辆予以特别便利，各医院免费收治患病难民，全国赈济委员会也分派专员赴各交通重要地点，联合当地士绅，共同组织成立难民运输站，接待逃亡难民，提供食宿，为其筹备运送车辆。并派员管理指导，以期减轻难民逃亡之痛苦。

国民党当局采取的种种救灾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黄泛区地域广大，灾民众多，有限的赈济款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灾民来说，实在是粥少僧多。而各方面的捐款用来解决黄泛区人民的灾难，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屈映光到黄泛区视察后，将郑县、中牟、开封、尉氏、扶沟、洧川、鄢陵、西

华、淮阳、太康等十县列为重灾区，派赈委会特派员曹仲植携款15万元，赴上述各县办理急赈。曹仲植在郑县、中牟两地发放了5万元。据国民党政府当时统计，这10个县的受灾人口达70余万。中牟县灾情最重，受灾人口达15万，加上郑县的受灾人口，将近20万。5万元的赈济款发放下去，一个灾民能领到多少钱？另外10万再发到其余8个县，一个灾民又能领到多少钱？灾民们靠赈济款能维持多长时间的生活？

由于赈济款太少，赈委会决定，灾民居住地凡与陆地相通，能徒步逃出灾区者，一律不散发赈济，让灾民自己设法迁徙他乡。

至于移民屯垦计划，由于需发给移民给养费、耕牛费、农具费、种子费、修筑窑洞费，每人共需发给62元，另外加上旅费及其他费用每人10元，共计72元。往黄龙山移民10万，就需经费720万元。再加上往其他地方移民的经费，耗资便更加巨大。因此，这项计划也迟迟未得到实施。直到1940年，才有5000余人迁往邓县，12000余人迁往黄龙山。迁往宝鸡的1000人竟无法得到安置。

黄泛区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千百万灾民仍然颠沛流离，无家可归。

在以后漫长的8年多里，洪水、瘟疫、兵燹、匪患、饥饿、严寒，仍然像一条条毒蛇般死死缠绕着黄泛区人民，并不断夺走他们的生命。



## 2. 郑州沦为悲惨世界，火车竟成“救生之船”

当房屋、财产、土地被无情的洪水吞没之后，千百万无家可归的百姓被迫踏上了逃亡之路。

在黄泛区两岸的大道小路上，随时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灾民，他们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牵着牛驴，在破筐里、小车上、牛驴的脊背上，是粮袋、锅碗瓢勺、破烂的衣服被褥和饥饿的孩子。这样的队伍，大都是在洪水到来之前逃离家园的。一些在洪水袭来后仓皇逃命的百姓，大多除了身上穿的，一无所有。



决堤后的百姓

平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成了灾民的集结地，而陇海、平汉两路的交叉点郑州城，则成了灾民的世界。四面八方的灾民向这里汇流，这些有幸没有死于洪水的人们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延续，他们把这些希望寄托在望不见尽头的铁轨上，寄托在火车上，他们要乘上火车去洛阳、去西安、去武汉……去他们以为能够活下去的地方。

郑州城内，不论是闹市通衢还是陋街僻巷，到处都是被饥饿煎熬着的灾民。废墟上、断墙边，出现了一个个用破席片、马粪纸搭成的小棚，那里成了他们的暂住地，而更多的人无福有一个这样的住处，到了夜晚，他们只好横七竖八地躺在屋檐下、小巷中或是废弃的街头工事里。甚至连城外的战壕和地堡里，也挤满了无家可归的灾民。一些商店、饭店、旅馆只要一开门，便会涌进一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灾民，伸手向顾客店员乞讨，使得一些店铺不得不请来警察把守大门。请不到警察的店铺只好关门大吉。居民们也大都终日关门闭户，生怕一开门，灾民们便会拥进去赖着不走。

郑州，已是一个快要被灾民挤破的城市。火车站，是这个灾民世界的中心。

成堆的难民麇集在车站外狭窄的广场上，孩子哭、大人喊，患病的人在呻吟。正值酷暑天气，烈日将地面烘烤得像锅底一样烫，但一些人往地上铺一件破衣或烂被，躺在那里，一躺就是一天。为了能挤上火车，饥饿、炎热又算得了什么？

乞丐们在人群的缝隙里穿梭转悠，有的满怀希望地从广场向市区出发，有的拈着装有几块饼头或几捧剩饭的布袋从市区返回，与等候在广场上的亲人分享这了不起的收获。为了这点剩饭剩饼，他或许已奔波了几十里路。

在乞丐队伍中，有满头华发的老人，有面呈菜色的中青年，有流着鼻涕的少年，有背着孩子的妇女，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们四面出击，到处乱钻。以至于大街小巷乞丐如云，一个行人走着走着，说不定就会有一个乞丐追上来，死磨活缠，直到他解囊施舍方告罢休。

有的人到处奔波，终无收获，便把眼睛盯在行人手中的食物上，趁其冷不防，突然袭击抢而夺之。此类事在灾民世界的中心——火车站经常发生。

一个文弱书生拿着一块烧饼正往嘴里送，突然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窜过来，一把夺下他手中的烧饼扭头就跑。文弱书生好不容易买了一块烧饼竟被人夺走，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但他追了几步便自动放弃了目标——那个孩子一面跑一面将鼻涕吐沫涂在烧饼上，就是再夺回来，也无法再吃下去。而那孩子见烧饼的主人不再追赶，便躲在墙角里狼吞虎咽，把涂着自己鼻涕吐沫的烧饼吞下肚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广场的另一角又起了骚乱，一个黄瘦的中年人赤膊上

阵，拼命追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追上之后，便将那老人像折芦苇般地板倒在地，然后饱以老拳。那瘦子边打边骂：“我用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一家人吃的，你个老混球儿，竟敢夺我的饼，想要我一家挨饿啊！”老人则一声不吭，死命地攥着他手里那块硬饼，任其打骂。

这时，10多个灾民从四周一拥而上，有孩子也有大人，一齐加入了争夺的漩涡。但他们既不是解救那老人，也不是帮助那瘦子，而是将十几双手顽强地伸向一个目标——老人手里那块硬饼上。

几秒钟后，争夺的焦点——那块硬饼便成了碎末，被大人孩子连尘土一道吞进嘴里。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老人则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鼻孔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干枣般的脸颊。

在一个通往车站广场的街口，一个老人伏地痛哭，他的肩上搭着一个空瘪的口袋。原来他卖掉了几件衣物，换了一升米，正准备背回家去，救一救饿得发昏的孙子。不料走到这里，被一个乞丐从后面偷袭过来，抽开了扎袋口的绳子，袋中的米撒了一地。四周的一群孩子一窝蜂围上来，乱抢乱抓，等到警察赶来，用棍子把乞丐驱散时，老人的米已所剩无多，大部分已被那些小乞丐连米带土生吃掉了。

……  
车站内的情形比车站外更惨。

入口处虽然有警察和士兵把守，维持秩序，但他们很难挡得住潮水般的灾民。尽管他们将棍棒皮带乱舞，用步枪横拦竖挡，有的人被皮带的铁头抽得头破血流，但灾民仍然毫不退缩，一批挤进去，后面又上来一批。灾民们都知道，滞留在灾民世界——郑州，难以生存，只有爬上火车，逃向四面八方，才能活命。

警察们即使能守得住入口，也守不住铁路两头，无数灾民从铁路两头不断进入车站，从铁路两边的矮墙铁丝网上翻过去，爬上月台。尽管进入站内，也迟迟挤不上火车，但灾民们能在月台上待着，心里便踏实了一半。

停在站内的货车，车厢里已堆了很高的货物，但在那货物的顶上，又挤上了密匝匝的灾民。在这些灾民的身旁，是破席烂被、小车条筐、锅碗瓢勺……虽然车顶上已拥挤不堪，人有被挤落车下的危险，但是这些从洪水中抢出来的可怜的财产，他们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扔掉的。

于正在卸粮食的货车厢附近，聚集着好些女人和孩子，他们眼巴巴地盯着卸车时漏在地上的麦粒，准备等粮食卸完后去扫，十几个持枪的士兵和拎着皮带的警察守护在车厢下面。有的孩子因急不可待，伸手去拾装卸工脚下的几粒麦子，立即就会挨上几下皮带。待到麦子卸完，士兵和警察离去之后，一场骚乱便跟着发生，等候已久的人们立即一拥而上，为多拾几粒麦子而在尘埃中挤作一团。在



激烈的争夺中，有的孩子手被大人的脚踩破，为几粒麦子付出了血的代价。

每当一列运送灾民的“专列”在月台旁停下来，都要出现一场混乱。聚集在月台上的成百上千的灾民，冲锋般拥向车门，争先恐后地往车上爬。老弱病残一不小心，就会被人的漩涡漩倒在地，被纷乱的脚践踏得奄奄一息或气绝而亡。呼唤亲人的叫声，母亲因孩子被挤掉在月台下的哭喊声，拼尽力气也未能挤上火车者的咒骂声在月台上轰响，负责运送灾民的管理人员喊破了嗓子，也无法维持秩序。

闷罐车内，男女老少肩挨着肩，脚挨着脚，就像被草绳捆在一起的秫秸般紧紧挤在一起。

而车门外的人们仍怀着一线希望硬往车厢里挤，有的人一脚踏进车厢，一脚悬在车外，两只手死死抓住车门，苦苦哀求：“叔伯大爷，往里让点，再往里让点啊！”车厢内的人则没好气地说：“不能上了，再上就挤死人了！”

车厢内“饱和”之后，车顶上成了灾民们争相占领的地盘。转眼之间，毫无遮拦的车顶上便像砌麻将般挤满了人，而下面的人仍然不顾一切地往上爬，直到人屁股坐在车顶，两脚伸在顶外，再也无法坐下一个人为止。

上不了车的人心里感到恐慌，上了车的人则需要忍受难挨的痛苦。车厢内空气污浊，闷热异常，令人窒息。身体虚弱的人待上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头晕恶心。孩子们则用啼哭表达他们的痛苦。汗流浃背的人们有的自我安慰：“车一开就好了，车一开就好了！”有的则咬紧牙，默默地等待火车开动。

车厢顶上虽有新鲜空气，但是头顶上是炽烈的太阳，身子下是烫人皮肉的镔铁，上烤下蒸，不断地消耗着人们体内已不充足的水分。有人喊口渴，有人晕倒，但列车好像被焊在铁轨上一样永远不会开动。

不论车顶上和车厢内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上了车的灾民就不会再轻易下来，他们生怕在他们下车的时候，火车突然开走。那些爬到货车顶上的人们也怀着同样的担心。所以，不管火车距开车时间还有多久，他们都一直在车上认真地坐着，火车停一个小时，他们就熬上一个小时，停上一天，他们就熬上一天。

火车，在灾民们的心目中，就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上了“船”，就会脱离苦海，逃脱死神的追逼，到达一个衣食不愁的乐园。

在车站上，只有一个声音，能使死守在火车上的灾民毫不犹豫飞快地从车上爬下来，那就是空袭警报。

黄水泛滥之后，日军沿陇海铁路两侧西进的计划虽被粉碎，但日军飞机仍不断出动，对平汉、陇海铁路沿线的主要城市进行轰炸，郑州是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

当空袭警报突然拉响的时候，车站内外的秩序比任何时候都要混乱。聚集在车站广场上的灾民像受到枪声惊吓的群鸟一样四散奔逃。车站入口处的压力顿时缓解，拥挤的人们瞬间散开，各自寻找隐蔽之所。站内月台上，那些为没挤上火车而发愁的灾民惊慌失措，丢下破烂家什到处乱窜，再也顾不得叹息与咒骂。最惨的则是那些固守在车顶上的人们，他们唯恐在车顶上多留一秒钟，一时间，纷纷争着下车，老弱妇女和胆小的人顺着扒梯往下溜，青壮年则从车厢顶上往下跳。混乱中，有人跌伤了腿，有人摔断了胳膊，但他们仍从地上迅速爬起来，跌跌趴趴地寻找他们自以为安全的去处。那些挤在闷罐车内的灾民，由于下车十分不易，便干脆待在车厢里听天由命。

转眼间，车站内外只剩下几个警察和士兵，以及灾民们丢下的破烂。

敌机有时只是在空中盘旋两圈，便飞向别处，有时则对到处乱窜的灾民投弹轰炸，俯冲扫射。于是一些刚从洪水里逃出来的人们，又不幸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之中。

空袭警报一解除，车站上又一次陷入混乱。有时于一日之中，警报竟响起数次，让那些准备乘火车逃难的灾民整日提心吊胆。

灾民们乘火车逃难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一群尉氏县东北乡的百姓从黄泛区逃出之后，步行来到郑州，在车站上等了两天两夜，才好不容易爬上火车。其中一位孕妇在与家人一道奋力挤上车后，不幸早产，晕倒在车厢里，由于失血过多，未到目的地就痛苦地死去。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在上车时挤断了肋骨，一路上疼痛难忍，不断哭泣呻吟。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从两节车厢之间往车顶上攀登，不料火车突然开动，青年从车上坠落下来，虽未丧生，却被车轮碾去了双手……

此类悲惨的事例实在是不胜枚举。

### 3. 求生者云集灾民聚散地，逃难人需闯多道“鬼门关”

花园口掘堤三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湖北时局日紧，已不是灾民们逃生的去处，而为防止日军渡水沿陇海路西攻，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下令将郑州至洛阳间的铁路破坏。黄泛区逃往西边的灾民们，只有步行两百余里，从洛阳乘火车逃往陕西各地。

从郑州到洛阳的公路上，每日逃荒的灾民络绎不绝。这两百多里路，对他们来说，不啻是一次万里长征。

那时候，河南妇女多裹小脚，在艰难的逃荒路上，长着一双“金莲”的女人便成了全家人的累赘。这些可怜的妇女，拼尽力气，扭酸了脚踝，磨烂了脚掌，一天也只能扭上二三十里地。因此，两百多里地，往往要走上十来天。小脚的问题还是次要的，灾民们在向西的征途中可谓劫难重重，敌机轰炸、土匪抢劫、饥饿、疾病、寒冷，无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经过多少天的艰难行走，能全家平安抵达洛阳的灾民实在堪称幸运。

洛阳位于黄河中游的伊洛盆地，东有虎牢险豁<sup>①</sup>，西有函谷要塞<sup>②</sup>，北依邙山，南对龙门，伊、洛、瀍、涧，蜿蜒其间。自古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

自公元前770年起，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先后在这里建都，故洛阳素有“九朝都会”之称。至元明以后，洛阳屡遭兵燹，故都的繁华渐渐逝去。

郑州形势危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洛阳，使这座不大的古城变得车辚辚、马萧萧，大军云集，商贾骤至，军政要员，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各机关部门也如雨后春笋般设立。与残破混乱、市容凋敝的郑州相比，洛阳显得繁华、安静、有

序。

但是，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便被潮水般涌来的灾民搅乱了。

灾民不断涌入这个仅有20万人口的城市，滞留在洛阳一时不能乘车西去的人，通常有五六万，有时竟多达10万以上。如果说郑州是灾民的世界，那么洛阳便是灾民最大的集散地。

为了维持市区正常的生活秩序，洛阳市警察局不得不命警察把守要道口，阻止灾民进入市区。涌入洛阳的灾民，大多集中在车站及附近的几条街上和城外的窑洞里。

对于灾民们来说，夏天是最容易度过的季节，讨了一天饭，晚上随便往街边巷口一躺，就能睡上一夜。冬天一到，便苦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洛阳的难民，收容所早已爆满，难民运输站虽然在车站附近街道赁了一些民房，安置待运的灾民，但也因房少人多，很多灾民住不进去。

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并时有雨雪，屋檐下是无法存身的，于是成千上万的灾民便到郊外去住那些废弃的窑洞。一些人连废窑洞也住不上，便在土坡上自己挖掘。由于人力有限，每家每户挖出的洞穴仅能钻进一家人，跟野兽的洞穴差不多。没有门，就用树枝扎一个篱笆，在上面糊上泥，以挡风寒。有的人连这样的洞穴也没法挖，就在地上掘一个一尺多深的坑，上面再用树枝扎一个棚，棚的形状不一，有拱形的，有人字形的，有尖锥形的，然后再在上面糊上泥，一家人便钻在里面挨过一个个寒冷的冬日。这些棚子，和西安半坡博物馆里保存的原始人的住处差不多。一些地方，搭满了这样那样的庵棚，形成了一个个村落——灾民的村落。

那些刚到洛阳的灾民，一时找不到住处，只得露宿在车站附近。寒气逼人的夜晚，他们就躺在地上，有的盖一件烂棉袄，有的裹一条麻袋片，有的家人盖一床破被。有的则什么也没有，只是缩头拢手，蜷曲在墙根。每天夜里，都有人因冻饿而死。

车站附近，沿铁道两侧的数尺高的土堆上，到处都是黑糊糊的洞穴和低矮的窝棚，在那洞穴和窝棚里，挤着一户户无家可归的灾民。

寒冷的冬天，严重地威胁着灾民的生存，同时也给乘火车逃难的人们带来说不尽的痛苦。当年的一位记者描述了他在洛阳车站的所见所闻：

车站里，一列列停着的火车顶上，挤满了鹑衣百结、面容枯槁的灾民。车下的人紧张而惶恐地推着、挤着、叫嚷着，车上的人将他们的亲人拼命往上拖，生怕新上来的人挤去了他们好不容易才占领的位置。上不了车的人在



到处乱转，盲目地爬上头等车、三等车、邮政车，然后被人赶下来，绝望地在列车的空当中绕来绕去。

火车的汽笛响了，这声音激出了他们的力量，我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在几分钟里从车顶爬上跃下三次。那是一节圆顶的铁皮车厢，有一丈多高，看上去并没有可攀登的地方。

车快开的时候，车上车下的吵嚷声、喊叫声、号哭声响成一片。我在邮车门边站着，忽然见车顶上落下一只系着半边的竹筐，车下一个白发老太太从几尺开外，把一个一两岁的孩子抛进筐里，那孩子两脚向前蹬着，系着半面的竹筐飞快地向上拽起，眼看孩子便要跌下，车上车下的人都发出惊呼，然而我看那老太婆却毫无惊慌的表情，手里已经又抱着一个孩子，等待竹筐落下。他们的心肠仿佛已因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变成了铁石，在一片惊呼声中，既没有表情，也没有恐惧。

然而，稍后时我才发现，他们是有感情的。车开动的时候，车下的人对车上的亲友拼命地喊道：“小心过洞！小心，小心啊！”从他们那牵肠挂肚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恨不得把这句话塞到远行亲人的心里。从洛阳往西，一路多隧道，他们生怕坐在高高货车顶上的亲人在过隧洞时，被洞口刮下来摔死。但是谁知道呢？也许几个钟头以后，他们的亲人便会血肉模糊地躺在



洞口前、天桥下。灾民当中是常有人在过洞口、过天桥时摔下来的。

月台下，不时有警察执着短棍，驱逐那些一窝蜂向火车上爬的灾民。车开的时候，我叩问一个手执短棍、因驱赶灾民而累得气喘吁吁的警察：“先生，这些人背井离乡，已够可怜。他们坐车，不过是为了去寻一条生路，你何必这样对待他们？”

我对他的行为表示非常厌恶。

不料警察却说：“你不知道，好心的先生，他们攀着车栏杆成百里成千里地走，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詹天佑’上，如果车脱了钩怎么办？他们是求活命的啊。像这样攀着栏杆的人，如果不赶他下去，他准会在路上摔死！”

他的回答，反倒叫我无话可说。

后来，我也挤上了一列西开的火车。傍晚的时候，忽然飘起雪花来。我在车厢里，脚已被冻得仿佛要凝结在车底上。坐在火车顶盖上一任风吹雪打的灾民，此时又是什么滋味呢？车顶上、车窗上，时时发出沙沙的响声，这声音使我一夜不曾得到安静。可以想象，车顶上那些挤簇一团的灾民已成了雪人，在呼啸的寒风中，他们身上单薄的棉衣像纸片一样难御严寒。

车开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了灵宝，我下车的时候，见路基下，一个妇人在守着一个老头的僵尸恸哭。我正心酸地看着这凄惨的场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走吧！这是夜里在车顶上连饿带冻死去的。平常得很，每天都有！”我回头看了看车顶上，见灾民们像石人般缩头拢手坐在车顶上，他们的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雪，男人的胡子眉毛上挂着一层白霜。

到达目的地之前，是否还会有人不幸死去呢？

……

由于这位记者坐在车厢内，所以他只是在下车时才看到从车顶上拖下的死尸。如果他是坐在车顶上，就会目睹车过隧道时，灾民被洞口刮下的惨状。

火车从洛阳西行，要钻不少隧道，这些隧道口对于车顶上的灾民来说，就像一道道鬼门关。在白天，灾民们还可以提前发现洞口，伏在车顶上，安全通过隧道。到了晚上，四野一片漆黑，灾民们很难发现前方有没有洞口。当快速行驶的火车突然钻进隧道时，坐在第一节车厢顶上的灾民，少则几名，多则几十名，要被低矮的洞口刮下火车摔死。没摔下车去的也多被刮伤。后面车厢顶上的灾民要靠遇难者的惊呼惨叫声，才知道火车“过洞”。而那些坐在堆满货物的货车上的人，即使在白天，也时常有人被洞口刮落车下。

这些惨死的灾民大多很长时间无人掩埋，尸体就曝躺在路基两旁，腐烂发臭，或被野狗啃噬，其状惨不忍睹。

火车到达陕西，须经过两个关口，一是陕县的太阳渡，一是潼关的风陵渡。这两个地方都在黄河南岸，而北岸就是日军的炮兵阵地。日军一发现南岸有火车通过，就开炮轰击。因此火车经过这两个地方时，必须在夜间熄灯，秘密行驶，才能减少伤害，灾民们称其为“闯关”。

火车，被灾民们看成释迦牟尼的救生船，然而，乘上这条“船”，也未必就能到达苦海的“彼岸”。

① 虎牢，关名，又称成皋，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② 函谷，关名，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后移至新安。

## 4. 拼命逃出泛区，转眼落入虎口

从黄泛区逃往“国统区”的灾民境遇是悲惨的。而逃往敌占区的灾民，则仿佛刚躲过豺狼追逼的羊群转眼又落入虎口，其命运更加悲惨。

当黄水铺天盖地而来时，一些百姓慌不择路，只知道往高处跑，往没有水的地方跑。迅速袭来的洪水不允许他们有一个冷静考虑的时间，而有些地区黄水泛滥幅面宽达数十公里，也不容他们选择逃难的方向和道路。所以，当成千上万的灾民向西逃难的同时，许多百姓正在逃往东面，逃往敌占区，以至于一些人未死于洪水而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

中牟县某村，地势颇高，黄水从村西流过，只淹没了该村部分土地。附近两个被水淹没的村庄的百姓纷纷逃到该村避难，他们或住在亲友家，或住在破庙和小学校里，或在村头搭起庵棚藏身。他们只盼着黄水下去后，回村重建家园。

谁知刚过了两天，这个村就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进庄后大肆屠杀、强奸、掠夺，无辜的百姓们有的被刺刀乱刺而死，有的被零割剥皮而死，有的被吊在树上用火烧死，有的被割去脸上的肉而活埋……一位从洪水中逃出来的70多岁的私塾先生，被日军用战刀将头颅砍下，让狼狗衔着到处跑；一个中年灾民被日军硬指为“密探”，被遭杀害后又被剖腹掏心。20多个躲在地窖里的百姓被日军发现，这些野兽先是向地窖里扔毒瓦斯弹，然后用石板堵住窖口，结果窑内男女全部被毒死……

妇女们大部分被日军强奸、轮奸，十二三岁的幼女和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未能幸免。有的妇女被轮奸致残，一些妇女被奸淫后，又惨遭杀害。一个50多岁的妇女正哭哭啼啼在黄水边寻找落水淹死的女儿的尸体，日军发现后，随即将她轮奸。躲在黄水边树丛中的几名年轻妇女被日军发现，无路可逃，一齐跳水自杀……

从洪水中逃出的灾民和本村百姓，在这场浩劫中共有200多人惨死，100多名

妇女被强奸。

太康县两百多个灾民结队逃难，走到睢县南面的河堤岭附近与一队日军遭遇。数十名灾民在逃跑时被打死，十几个受伤的灾民被日军用刺刀乱戳毙命。剩下100多人被日军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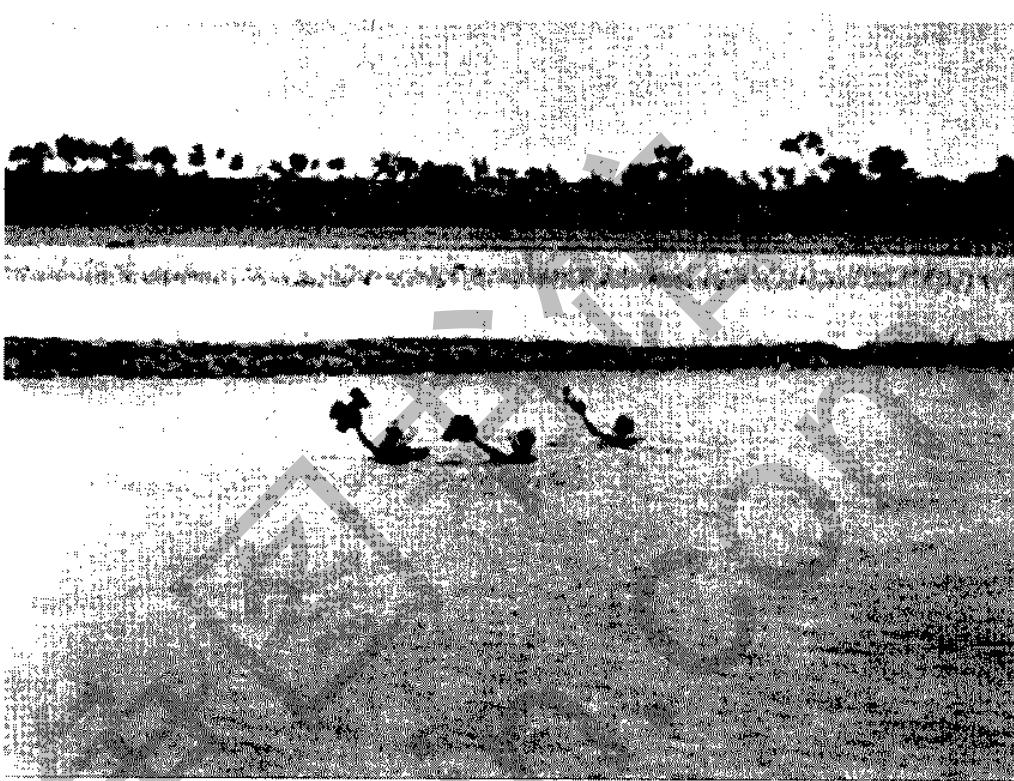
日军强迫他们扛行李、背弹药，并叫一些妇女跪在地上，充当“上马石”。妇女支撑不住，稍有晃动，日军士兵便用皮鞋在她们身上乱踏乱踢。一些老人和十几岁的孩子因力气小，行动缓慢，时遭日军士兵鞭挞，或以刺刀乱扎。沿途惨叫哀嚎之声不断。

日军押着这些灾民，走到一条河边时，忽命队伍停下来休息。并通过翻译告诉灾民们，他们已完成任务，可以离开。灾民们闻之，多面露喜色，一齐沿河边往北走去。不料他们没走多远，身后便响起机枪声。毫无防备的灾民们一片片倒下。一些活着的惊恐地四处乱跑，但河边地势开阔，这些人都在奔跑中被日军的子弹击倒。有几个人跳入水中，想泅水逃命，也被打死。

日军离去后，一个幸存的灾民从一处灌木丛中钻出来，见河滩上、路两旁的草丛里，到处都是尸体，河水也被灾民的鲜血染红。有几个负伤未死的人在血泊中呻吟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在母亲的尸体旁放声号哭。这个幸存的灾民既无力掩埋乡邻的尸体，又无法救治受伤的人，只得带着那个女孩重踏逃荒之路。

扶沟县十几个灾民乘一木筏逃生，刚上岸就被一小队日军截住。日军将其中两名妇女扒光衣服，当着其余灾民的面轮奸后，又用刺刀逼着一个60多岁的老人脱掉衣服，当众奸淫其中一个20来岁的妇女。老人不从，被两个士兵强行抬到那个妇女身上，其余士兵则在一旁拍掌淫笑。

日军将这些刚从洪水中逃出的灾民戏弄蹂躏一番后，便架起机枪，逼着他们走向一片河滩。结果10多个灾民都陷在齐胸深的淤泥中窒息而死。



花园口决堤月余，黄水便已入淮，沿淮城镇多受泛水之害，至7月下旬，安徽的蚌埠市及作者故乡凤阳县的临淮关镇全部被洪水淹没。受灾地区百姓被迫四处逃生。日军趁机捕捉青壮年灾民，或送往东北做苦工，或留在占领地修筑公路炮楼。蚌埠一带5000多名青壮年被日军捉去后，以闷罐车运往东北煤矿做工。车到山东某地，遇国民党军游击队阻击，铁路被炸毁，停车两昼夜。日军怕灾民暴动或逃跑，一直不开车门。直到数日后，火车开抵北京，日军才在严密警戒下，打开车门向车内送饭送水。当时正值酷暑，车内灾民因饥渴和闷热患病而死者达2000余人。

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地区，强行征集大批中国百姓为其服劳役。成千上万从黄泛区逃出来的灾民被日军抓去修路架桥、筑碉堡。日军将他们视为牲畜，任意打骂虐待。许多人在服苦役期间，被日军毒打折磨致死。日军虐待折磨民工，不仅花样繁多，且十分残酷：

强迫民工趴在地上，嘴里衔着鞋，头翘起，在地上爬行，谓之“学王八”。为了使爬行的人头不断摇动，日军使用冷水往其头上浇。学“王八”爬行的人肚子不准挨地，肚皮稍有着地，日军立即脚踢棍打。一灾民因爬行时间过长，肚皮挨了地，被日军毒打致残。

强迫民工四肢着地，身躯拱起，让日军士兵骑在身上，以皮鞭不断抽打，谓之“学马走”。直到灾民双膝磨烂，鲜血直流，爬行不动，日本兵仍骑在他身上用鞭子乱抽。

强迫民工模仿猴子蹦跳，学猴叫、学唱戏。因这种惩罚较轻，故日军经常为之，以此取乐。

更为残酷的刑罚是“支锅”、“打夯”、“捧火球”。

“支锅”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脸朝天，手脚着地，腹部拱起；一种是脸向下，四肢着地，背部拱起。日军在民工拱起的身体下面竖插刺刀，命其在烈日下暴晒。有时身上还压上一个人。“支锅”者时间一久，四肢无力支撑，腹部下落，就会被刺刀穿身丧命。

“打夯”是由四个日本兵抓住民工的手脚，一齐喊着号子，将民工的身体举过头顶，再往地上猛摔，一些灾民被摔得内脏破裂，七窍流血而死。

“捧火球”是强迫民工以双手捧燃烧的火炭。有的灾民因年老体弱，干活无力，便会遭到这种惩罚。当民工捧着刚出炉的炭火，双手皮肉被烧得吱吱冒烟，向下滴油，发出一股刺鼻的焦臭味时，被强迫围观的灾民为之痛心落泪，日军则在一旁拍手狂笑。

服苦役的灾民们除受酷刑惩罚外，被日军打掉牙、打伤腰、打断腿者不计其数。

## 5. 市县虽设收容所，灾民难入“幸福圈”

黄河决堤3个月后，据国民党政府统计，仅河南一省，待赈灾民已达150余万。这虽是一个保守的数字，但也足以惊人。随着黄水泛滥面积的逐渐扩大，这个数字仍在不断上升。这些灾民除部分逃往敌占区，部分留在家乡苦熬度日以外，大部分逃往郑州以西。

国民党政府和一些慈善机构、民众团体，相继在灾民云集的城市与县城办起了收容所、粥厂、难童学校等救济单位。由于当局及各部门经费短缺，这些救济单位能够接纳的灾民十分有限。而有些收容所，米饭场条件很差，灾民们即使有幸进入，也难保不病饿而死。

### 郑州收容所惨状

郑州豫丰纱厂内，设着一处难民收容所，这是郑州有限的几家救济单位之一。灾民们住进去后，每天可以吃到两顿米饭，又称“米饭场”。

灾民们听说住进难民所能吃上大米饭，便从四面八方涌到豫丰纱厂。但难民收容所只能容纳2000多人，大部分灾民被拒之门外，只能在围墙外面想象手捧一碗白米饭往嘴里扒的滋味。这滋味对于被饥饿煎熬着的人们来说，简直如上天堂。

但是，那些捷足先登，有幸住进去的人，则发现此处并非久留之地。

在难民所的大院内，屋里屋外都挤着一堆堆灾民，他们或坐在地上发呆，或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昏睡，等待开饭的时间到来。院内地面，肮脏不堪，到处是烂菜叶、乱茅草。由于灾民们随地大小便，墙角里粪便成堆，尿水横流，臭气随风四溢，充斥院内。饿极了的人刚进去，领到米饭，吃得很香。然而一旦腹中有了



同病相怜的灾民们都为之垂泪。

难民收容所内的气氛因此日渐愁惨。

中牟县李相庄几户灾民住进收容所不久，就不断有亲人染疾死亡。秦敬宗的伯父、伯母因孙子死去悲痛异常，两天不吃不喝，后来也传染上霍乱死去。秦敬宗的伯母咽气之前，拉着侄子的手极凄惨地说：“孩子，俺不中了，你可千万要把俺的尸骨搬回家呀！”说罢便瞑目而逝。

一家人于数目内便有3人死去，秦敬宗悲痛欲绝。他哀哭着，请村邻帮忙，把老人的尸体拉到五里堡埋了，打算等黄水下去后，再将骸骨移回家乡。随后，李相庄的秦、李、张、王几家，每家不是死儿就是丧母。该庄几户灾民见难民所实在难以存身，只得离开郑州，逃往洛阳，寻找一条生路。

尽管如此，每天都有成群的灾民聚集在豫丰纱厂门外，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院内，希望能替补那些死亡或离去的人，进难民所吃上一顿米饭。他们白天未能进去，晚上就躺在大门两旁的围墙下，巴望第二天能轮到自己，不少人直到饿死，也未能享受到吃一顿米饭的难民待遇。

后来，国际救济会也在郑州办起了几个粥厂和收容所。但这些地方严格限制

点食物垫底，就感到那米饭难以下咽。米饭新陈不分，里面不仅有沙子、稻壳，甚至还有老鼠屎，灾民们吃起饭来，不得不像富家子弟那样细嚼慢咽，否则一不小心，立即就会有一粒沙子硌掉你一块牙齿。

没过多久，所内便流行起伤寒、霍乱。许多人因此染疾，或呕吐、腹泻不止，或躺在地上昏睡不醒，或因高烧不住地抽搐痉挛。虽然有医护人员给病人送药打针，但是难民所的杂役每天都要往外抬出几具死尸。每有死尸抬出，总有亲人跟随其后，长哭短号，悲啼之声经久不止，而

收容人数，超过限额，一律拒之门外。在这些粥厂和收容所门前，一批批灾民满怀希望而来，灰心丧气而归。有的人跑了很远的路，不甘心就此罢休，就横下一条心，在门外寻找入内的机会，每遇有些身份的人出进，他们便上前牵衣扯袖，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要他写条子，出面说话，使他们得以进去喝上几天麦面糊糊。但极少有人能如愿以偿。有些饿得还剩一口气的人在门口徘徊，一两天也不得其门而入，最后饿死在门外，尸体被救济会掩埋。

郑州的难童学校共收容难童七八百人，他们不但没有了家，而且大部分没有了爹娘。这些孩子，在被收容前多半是有爹娘的，但到了冬天，他们的爹娘相继因冻饿而死去，几乎每天都有孩子哭着要救济会施舍一口棺材，以埋葬他们的父母。

难童学校门口，经常有一些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在那里往院内张望，希望看一看他们欢蹦乱跳的孩子。但他们自己却空着肚子，口吐黄水。有的上午还在门口带着一丝欣慰的表情往院子里张望，下午便成了饿殍。

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到难童学校去看她的弟弟，结果饿死在学校的井边，一只胳膊被狗吃掉，尸体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一个老人去看他的孙子，饿死在一间空屋里，两天无人掩埋……起初，难童学校的校长一发现有人死在门口，就请求国际救济会派人抬去掩埋。灾民们知道这里肯埋死人，便在夜间偷偷将亲友的尸体搬到学校门口，弄得学校每天清早开门，都会看到几具死尸，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多。结果弄得校方再也不敢多行这样的善事。

灾民们把收容所、粥厂、难童学校当做“幸福圈”，有的人幸运地进入了这个圈子。但有的人要进去，却像登天一样难，因为这个圈子太小了，不，因为圈子外面的灾民太多了！

郑州市区的灾民并未因为有了几个救济单位而见减少。一批批灾民继续向这个城市汇集，其中许多人是从敌占区冒死偷渡泛区逃到这里来的。在郑州街头，随处可以见到一群群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灾民，有的躺在路边，有的蹲在墙角里，有的待在门楼下，有的强抖精神，跟着行人哭叫行乞……

郑州，仍然是一个灾民的世界。

### 洛阳收容所与西安灾民区惨状

洛阳、西安、武汉等城市，也和郑州一样，有一些救济单位。其开办的形式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都是共同的，那就是粥少僧多。

在洛阳火车站附近，有几个粥厂。粮食吃光，又找不到活干的灾民可以到

粥厂去登记领一张“饭证”。灾民们为了领得一张饭证，不得不在门口排很长时的队。领了饭证的人需先干挑水、扛粮等杂役，而后才能吃上舍饭。有的一家七八口人，领了七八张饭证，而能干活的只有一两个人，于是这一两个劳动力就得把七八人的活都给包了。在各种杂役中，仅挑水一项，就能将一个汉子累得头晕眼花。洛阳的水井一般都有十几丈深，打水用辘轳往上搅，身体已经被流浪和饥饿折磨得虚弱不堪的人，一桶水打上来就大汗淋漓，两眼发黑。如果一张饭证需挑3挑水，那么一个7口之家，就要挑上21挑。这个劳动量若是放在一两个人身上，吃上一顿饭就要被累得腿疼腰酸，好几天振不起精神去挣第二顿饭。

人口多劳力弱的人家，只得把领到的粥兑上水，加些野菜，一顿饭当做几顿吃。一些被饿得皮包骨头，连走路都没力气的人，连这样的粥也喝不上。

在西安，有的难民收容所办得颇像样，只要能住得进去，不但吃饭有保障，有病的还被送往医院治疗。年轻力壮的灾民，还可被安排干些杂活，挣点零用钱。灾民的孩子还可以去上难民学校。

发给灾民的口粮有玉米和面粉，12岁以上为大口，每人每天1斤，20岁以下为小口，每人每天6两。隔5天发放一次。收容所工作人员每隔几天，便到灾民住地进行慰问，说一番颇富同情心和关怀的话语：

“出门人可怜，好出门不胜赖在家啊。”

“咱们到人家陕西，与在河南家乡不一样了，可要守规矩，不敢胡作乱为，以免受损失。”

.....

由于灾民来自四面八方，比较散漫，易出乱子，收容所还安排专人进行辅导，以免发生意外事故，陕西省分管赈济的官员有时还到收容所召集难民开个会，讲讲话，问问生活情况。

当然，能住进这样的“幸福圈”的灾民实在是少之又少。

西安也有粥厂。有的粥厂每次只散发少量的粥券，许多人排上一两天的队也难领到一张。而领到粥券的人也只能吃上十次粥。在他们领券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在他们的难民条上盖上戳记，不得再领第二次。这样的粥厂招待的是过境的灾民，但灾民们历尽辛苦来到西安，不死也脱了一层皮，哪里还有“过境”的力量？

西安历史悠久，自西周以下，有10个朝代在此建都，而秦、汉、唐时代堪称鼎盛。自古以来，关于西安的神奇传说数不胜数。在和平年代，西安就颇令人神往，此时在灾民心目中，更是一个“福地乐园”。他们在郑州和洛阳时就想，到了西安，一切都有了办法。

西安的城垣比洛阳宏伟，城池也比洛阳大得多，街道纵横，南北垂直交叉，既宽且长。由于远居后方，市面也远比郑州和洛阳繁华。像郑州那种成群结队的灾民在街上游荡乞讨的情景，在市区是看不到的。当然，并不是西安就没有灾民，而是和洛阳一样，当局为了市容的整齐雅观，不准衣着破烂的人群进入市区。



灾民的大本营，在西安的东关和北关，在西安的郊区。

在这里，灾民们想找一个藏身之所，比洛阳更难。洛阳城外尚有黄土坡可掘窑洞，而西安地处渭河盆地，一马平川，往北100多里，才可看见高原余脉。那里倒是有窑洞可住，但是住在那里的出路只有饿死一途。许多灾民只能在平地上挖出一条小沟，再从小沟一端掘一小洞，一家人像老鼠一样挤在洞中。母系氏族公社半坡村遗址，就在西安东郊的浐河东岸，灾民们的洞穴和六七千年前的原始人相比，还要差得很远。

战争和洪水，使灾民们的生活状况重新回到了穴居时代。

几个收容所，容纳不了数以万计的灾民，几个粥厂更无法填饱他们的肚子。更多的人仍然流离失所，挣扎于饥寒交迫之中。

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许多怀着一线希望逃到西安的灾民，因寻不到一条生路而灰心绝望到极点，有的活活饿死，有的则全家自尽。

## 武汉逃难者惨状

武汉的灾民和郑州等地相比，人数要少一些，但也一直保持数万之众。花园口掘堤之后，日军主力转移进攻方向，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逼。至8月份，武汉的局势日趋紧张，市区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市区外围，军队调动频繁，有关保卫武汉的游行集会等活动接连不断。这种大战在即的气氛使灾民们深感惶恐。他们都是从敌占区、从黄泛区逃难逃到这里来的，想不到这里竟要成为战争的中心，他们是从一个灾难的漩涡逃到另一个灾难的漩涡里来了。

武汉当局虽然采取了措施，将一部分老弱的难民疏散到湖南、四川、陕西等后方省份，但由于交通方面的困难，仍有许多难民滞留在武汉惶惶度日。那些原先庆幸自己能住进难民收容所的人也感到那里待不下去，纷纷要办理退所手续。因为他们在进所的时候交了三角钱的“登记费”，许多难民为交登记费而付出了他们的全部财产。

一位《新华日报》记者记述了当时武汉难民收容所的情形：

……虽然他们来到武汉，被救济会、红十字会……收容了，可以暂时活下去，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敌机又跟踪追击到他们头上。好几处会馆的难民收容所被炸，又使他们惊慌起来。

“要想活这条贱命，才跑出来，谁想到鬼子还是不让俺活下去。我的女孩子，也被那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在武昌救济会分会的门口，一个面孔憔悴，衣服褴褛的老婆婆哭诉着她的苦命，“什么地方都不能安生，武汉不是安全的地方，难民所更不是安全地方。可是没有车，没有船，走也走不了，自己又没有钱，只有死挨日子。”她苦恼地皱起眉头，感到生之渺茫。在周围坐着的10几个人，也感到前途黯淡无光。他们都是要离开难民所，等着办理手续的，可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何处是他们的去向呢？！

“我要我的三角钱！我不住所，你们不用管……”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在汉口红十字会分会的难民登记处，再三地要求退还他已经交过的三角“登记费”。有几个人劝他：“还是住收容所好，你这么大的年纪了，怎能走动！”可他还是坚持要那三角钱：“你不用管，我等不得！”一个办理登记手续的人不耐烦了：“给了他，给了他！”这老头终于从怒气冲冲的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三角钱，步履蹒跚地离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跟着，一个30来岁的男子也要求退还他的三角钱。他还破喉咙高嗓子地诉说：“我等了一个多月了，还是走不了。这三角钱在你们看来是小事。可那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坐车没有钱，步行又跑不动，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只有坐以待毙。他们住的都是些旧式房屋，离市郊很远。待警报响起时，要想从住地跑到市郊躲避，真是难上加难。所以有许多难民一清早就起来，夹着仅有的几件破衣服跑到租界的江边，呆呆地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消逝。直到日落西山，夜降人间的时候，他们才踏上归途、回收容所吃晚饭……

年轻一点的难民大部分都计划编队步行，疏散到后方去。第一、二收容所的难民已经整队出发了。可是，有些年轻的难民，离不开他们年迈的父母，放不下他们的妻儿，“走要走在一起，死要死在一块”，他们就在这执拗的意识支配下，领了两块钱的疏散费之后，又开始了流浪乞讨的生活。在大街上、饭馆里……有黑手黑脚的小伙子，有蓬头垢面抱着正在吃奶的孩子的女人，还有只穿着一条短裤躺在墙根下的瘦得像干柴一样的孩子……“老爷们，赏几个钱吧，我们是难民，没有钱走不了哇！”乞讨的哭叫声走到哪里都能听得见。

是的，他们是难民，有些人胸前还佩着一块白布的“难民证”。他们之中，有些是年轻力壮的人，如果政府能给予物质的食粮外，再给些文化的食粮，把他们组织到抗战队伍里来，救了民也救了国，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吗？



灾民背井离乡

### 县城收容所惨状

在一些县城，也设有收容所、粥厂。





在靠近平汉线的郾城，难民收容所设在车站街中段。该所附设一个粥厂，位于车站街的东头。粥厂里搭着宽广的席棚，棚内有一排排用土砌成的台子。粥厂一天开两次饭，粥可以尽量吃，而在难民收容所限额内登上记的人，还可以领到两块玉米面和米面混合蒸成的馍。每次开饭之前，粥厂外挤满了等着吃粥的灾民。他们一个个手里拿着粗瓷大碗和一块咸萝卜，等候粥厂开门。开饭时间一到，吃粥的灾民按登记次序进去，把碗放在土桌上，粥场的职工端着粥盆，按顺序把粥倒进碗里。一批人吃完了，一批人再进来。吃粥的人不仅男女老幼都有，而身份也参差不齐，有农民、有学生、有工人，甚至还有商人和小官吏。兵燹和洪水使这些人统统成了灾民。

由于县城的灾民较少，有些地方的粥厂、舍饭场办得颇像样。但由于经办人员层层克扣，情况到后来就有了变化，施舍的粥饭从开始的稀粥加杂面窝窝头，变成稠粥，后来又从稠粥变成面汤和麸面汤。灾民们能领到稠粥时，还可勉强度日，他们把领到的粥端回家，兑上水，掺些野菜，领一次施舍可以吃上两三顿。到后来只发面汤时，灾民们就支撑不住了。有些领汤的人由于长时间受饥饿煎熬，身体虚弱的只剩下一口气，拎着一瓦罐稀汤走不到住地，就倒在路旁死去。

当时，部分国民党军队也在驻地开展收容、救济灾民的工作。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就在豫南唐河县驻地开办了难童收容所。孙连

仲的夫人罗毓凤，在《我与孙连仲将军》一书中追忆她当时随军办理收容工作的情况时写道：

……将军在信中并说：黄河泛滥成灾，尉氏、鄢陵、扶沟、太康、洧川一带尽成泽国，房屋被淹没者甚多。加以年来的旱灾、蝗灾，无数难民流离失所。唐河一带已有成群的孤儿涌入，惨不忍睹。要我随军办理收容救济工作。孩子们何罪，竟遭此浩劫？遥闻之下，戚然就道。时值雨季，途中桥梁多遭大水冲毁。按正常情况由沔县乘汽车至唐河算是不远。这次却走了十数日。

到达防地时，因途上劳累过甚，竟至病倒。复元后已是秋末冬初。无家可归之孤儿，衣不蔽体，逢人乞食。寒风瑟瑟里都在庙前街头，三个一帮五个一簇地偎缩在一起取暖。呻吟哀嚎到处可闻。触目所至，就是铁石心肠也得落泪。我忧惶地对将军说：难道地方上就能袖手旁观吗？将军很沉痛地讲：地方政府财源有限，又加连年战乱，无力收容救济。而军事单位在战局紧张之时也无法兼顾，因此希望你能计划较妥当的办法。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彻夜未眠，脑海里不断地想，如何救济法呢？外面不断地哀嚎喊叫声音，使我心如刀割。我不能再听下去。不待天明，我就乘车至各村镇，察看民房情况。唐河因为接近战场，人民大多早已逃避他乡。地方上已成十室九空现象。我在离总部较近而交通方便的焦庄，选择了一些民房作为收容所。定名为“二集团军临时难童教养院”。并向军方洽借余粮及被褥等用具，由战士们协助用稻草铺地作为临时床铺。待一切准备妥当后，我即赴街头巷尾加以收容。起初难童不明白为何要收容他们，反而有点害怕。等我耐心地讲明后，他们就蜂拥而来。三四个小时之间就收容了500多名。到了收容所时，我才发现这批难童的问题，不仅只是衣食住而已，他们大多数都患上不同的疾病。例如肺病、黑热病、疟疾、伤风等症。当时除了烧热水给孩子们清洗污垢头虱而外，使我最难的就是如何来解决孩子疾病的治疗问题？又如何找医生和药品呢？经过和将军商议之后，决定先召集全县医疗人员，协助成立一处独立医务所，并向军方洽借储存的药品用具，如此才算完成了战地抢救的初步工作……

总之，在大城市也好，在小县城也好，在军队驻地也好，能有幸挤入收容所、粥厂，吃上几天救济饭的灾民为数甚少，而依靠吃救济饭度过灾荒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 6. 背井离乡逃荒路，生离死别血泪流

在千百万背井离乡的灾民中，有多少户人家鬻儿卖女，妻离子散；有多少户人家遭兵燹匪患，家破人亡；有多少户人家全家死于冻馁；而今已无法统计。但是，在当年的黄泛区，许多老人都有一段逃荒的经历。每当他们叙起往事，那发生在逃荒路上的血泪交织的故事和一幕幕生离死别的惨剧，更会将听者带入那个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年代。

### 逃荒痛失两骨肉，返乡夫妻成永别

尉氏县卞庄村农民王氏（1991年口述记录）：

1938年，老蒋扒黄河放水的时候，俺家住在张铁村，一家老小6口人，俺丈夫叫李合志。那年秋天，黄水淹了张铁村，俺家的两间草房也被水冲塌，地也淹了。全家人为了活命，就到瓜村投靠亲戚。谁知落难人常是雪上加霜，在瓜村没住几天，俺婆母就去世了。

亲戚家一下添了几口人，一点存粮经不住吃，日子越来越难过。合志和俺愁得整夜整夜难合眼。后来俺娘家人也逃到瓜村，俺爹就劝合志去陕西逃荒，说“西省”活路好找，粮食又贱，到了那里好活人。可合志心里犹豫，他一怕举目无亲难存身，二怕路上遭歹人截杀，三怕路远去了难回来。俺就劝他说：“亲戚家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俺总不能叫人家受累，老在这住着不是个常法啊。”合志思来想去，没有别的活路，就答应带着全家人去陕西逃荒。

那时俺3个女儿都小，大女秀兰9岁，二女玉兰3岁，三妮才几个月。合志弄了一辆土车，推着3个孩子和破衣烂被、锅碗瓢勺在头里走，俺在后头跟着，俺一家5口，就这样上了逃荒的路。



味。人家自己都没有吃的，谁还管俺要饭的！

俺大女秀兰饿极了，经过一片胡萝卜地，就上地里扒了几个胡萝卜，连泥带水吃了两个，剩下几个带回来给俺跟合志吃，可巧被财主看见了。那个财主不容分说，便喊人把合志抓到联保处，吊打了一夜。俺怀里抱着三妮，带着两个大的，跪在财主面前苦苦求告，他们才把合志放了。

合志被打得浑身是伤，路都没法走，俺一家人抱头痛哭一场，只好暂住在一个破土地庙里存身。一家人走又不能走，要饭又要不到，合志就跟俺商量说：“孩子他娘，俺们总不能在这硬挺着，得想个法子啊。”

俺问：“你说咋办哩？”

合志说：“依俺看，不如把秀兰送给人家，换点粮食，俺伤好了就上路，能撑到洛阳就不怕了。”

俺说：“孩子这么小，送给人家恐怕要遭罪啊。”

合志说：“遭罪也比眼睁睁饿死强。”

俺愣了半晌，心想事到如今，也没别的路可走，就答应了。

秀兰听说要把她给人家，扑在俺怀里又哭又闹，说：“俺娘呀，你把俺给了人家，俺往后就见不到你们，见不到玉兰和三妮了，俺就是饿死，也不到人家去呀。”

孩子一句话说得俺眼泪刷刷地淌。她爹就在一边劝：“秀兰啊，你到了人家就不挨饿了，俺和你娘到了‘西省’，日子过好了，就来接你，到那时，爹天天给你吃饱。”

俺是个小脚，平时在家还可以，出远门可就遭了罪。俺跟着车子慢慢地扭，一天下来，脚脖子就肿了，脚掌也磨烂了。就那俺也得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好不容易走到荥阳县，亲戚送俺们的一点粮食就吃光了。俺们全家一连三顿没吃饭，大人走不动了，孩子饿得直哭，俺跟合志就端着个粗瓷碗挨家去要饭。谁知要了半天也不够一家人吃一顿。那里的人也是十家有八家断粮的，有的人把落地的小柿子，榆树皮搁在一起磨面吃，有的人吃起了白土。能要到一块糠皮饼子，就像是吃到了山珍海味。

面馍馍。你现在可得听爹的话啊。”

合志好说歹劝，秀兰这才不哭不闹。合志就拄着棍和俺一道带着秀兰，到村上打听谁要收童养媳。后来，陈村一家富户愿要，价钱是两袋谷糠外加两块钱。

谁知秀兰到了人家门口又变了卦，她先是跪在地上抱着俺的腿又哭又喊，俺装生气，不理她，她就在地上哭着打滚。人家看了也不忍心，就说：“孩子实在不愿意，就别勉强了。”合志一听着了急，拿棍子朝秀兰身上打了两下，恶声恶气地说：

“你要是不听爹娘的话，爹娘从今往后都不认你了。明天到了‘西省’日子过得再好，也不来接你。”

秀兰这才止住哭，从地上爬起来，抹着眼泪说：“俺爹、俺娘，俺听你们的话，俺不哭了。”

俺一直瞅着俺女儿跟着人家进了大门，秀兰临进门，还回过头来眼泪鼻涕地对俺说：“俺娘，你跟俺爹日后可要来接俺啊！”

俺听了，心就像刀割似的，俺女儿的泪脸和那句话，俺一辈子也忘不掉。

俺女儿一进门，那家人就把门关上了，俺和合志在门口愣站了好一会儿，直到送谷糠的人催俺们走，俺们才回破庙。

合志回到庙里，就一头倒在草铺上，放开声哭喊：“秀兰唉，爹对不住你啊，临把你给人家，还打了你两棍子，爹该死啊！”一边哭着，一边拿手打自己的脸，俺在一旁劝也劝不住。

过了几天，合志伤好了些，俺一家就上路了。合志只能强撑着走路，土车只好让俺推着。俺们走走歇歇，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地。一路上，俺不断看到死人。有一回，俺看见路边麦地里有3个死尸，一个是白发老头，脸朝下趴在麦地里，身上的棉衣被人家扒了；一个是妇女，仰脸朝天地躺着，身旁还扔着打狗棍和破竹篮；还有一个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也许是一家人。一条黑狗啃着那个孩子的腿。合志看不下去，拾起一块石头把狗赶跑。哪知俺们一走过去，那条狗又跑了回去。还有一回，是在天快黑的时候，俺看见路边干沟里埋着一个人，因为埋得太浅，一头黑发很长，披散着露出土外，两只脚也露在外面，一只脚上还穿着鞋。俺想，那也许是个闺女，妇道人家没那么长的头发。也许是天快黑了，这个没埋好的死尸叫俺看了好可怕，一连两三天，俺晚上一闭眼，那披散在地上的黑头发就在俺眼前直飘。

当时俺的三妮正吃着奶，俺吃糠咽菜，有一顿没一顿，白天还要推土车，几天下来，头老打晕，人眼见着瘦。合志怕俺有个三长两短，撑不到“西省”，就横下一条心，要把三妮丢了，保俺。俺们走到石寨沟集上，合志忍着泪把三妮抱下来，放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想让谁个好心人抱走。孩子一放在地上就哇哇直哭，俺听了就像乱箭穿心。孩子虽小，也是娘的心头肉哇！俺已经丢了秀兰，现在可不能再把三

妮也扔了。俺想着，就要去把三妮抱回来，合志左拦右劝，硬是不叫俺去。约莫过了一袋烟的工夫，俺见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过来，抱起三妮，向南边走去。

俺的五脏六腑都像被人家掏走了似的，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上，俺直哭了半晌，才推着最后一个女儿玉兰，跟合志一块赶路。

俺一家6口人，逃荒的路才走了一小截，就死了一口，丢了两口。后来，俺们听人家说，灾民逃到陕西也难存身，饿死的老多，就打消了去“西省”的念头。

合志和俺带着玉兰，在外帮工要饭，过了半年，心里老惦着家乡。第二年麦熟前，俺们一家就往回赶。到了南市集，俺觉着头疼，身上发烧，肚子作胀，走路一点力气也没有。合志只好向一个熟人求告，借了一头驴，让俺娘俩骑上先走，他一人推着车子随后赶路。

俺和玉兰骑着驴，走着走着，突然天变了，一天的云彩，老黑，雷打得像山崩似的。接着就下起雨来，雨大得像瓢泼。俺看离咱村还远，就赶着驴，一路小跑，进了尉氏城。

俺好不容易找到亲戚杨印家住下。当天晚上，俺的病就重了，发烧烧得说胡



话。杨印家有人怕俺死在他家，要把俺往城隍庙里送。可杨印心肠好，没答应，还请来郎中连夜抢救。后来，俺才知道俺得了伤寒症。

过了几天，俺病好能走路了，就返回南席集去找合志。俺一路走一路问，也没问出个音信。俺想，他或许看天要下雨，拐到通院村他姑母家躲雨去了。就赶到通院村打听，可合志姑母说，那天下午，合志推着辆土车到她家去过。他说肚子饿，想找点吃的，她给了他两块杂面馍。他一面吃着，一面就上了路，没走多一会儿，天就下雨了。俺又顺着合志姑母指的路往回打听。走到大槐树村，一个50多岁的人告诉俺：“几天前下大雨时，俺看见一个30来岁的汉子，倒在庙门跟前，身旁还有一辆土车。第二天雨住了，俺经过庙门口，见人和车子都不见了。”

俺想那人一定是合志，难道他……俺忍不住放声大哭。回尉氏的路上，俺像发疯似的一路走，一路喊：“玉兰他爹，你在哪呀？玉兰他爹，你可不能把俺娘俩丢下啊……”

可俺喊了一路，也没人答应。

一晃多少年，合志死活无音信，俺为了活命，只好改嫁到大庄村。

咱村被水淹，俺一家出门逃荒的事虽说离现在已经50多年了，可俺一想起来，心里就老酸，李合志自那年和俺在南席集分手后，到底是死是活，现在也无法知道。



## 融融八口之家，只剩孤儿寡母

尉氏县段庄村农民王瑞英（1991年口述记录）：

俺13岁起当童养媳，来到段庄村。俺丈夫刘焕弟兄3人，老二叫刘货，老三叫刘五，一家老小7口人住着3间破草房。

1938年，日本人打到俺家乡，老蒋扒开黄河堤，黄水很快就流到咱庄。庄上房屋十有八九被水冲塌，俺家的茅草房也倒在水里，屋顶也顺水漂走了。

水刚来时，一村里人都逃到北岗大庙里，有田产的都盼着水下去，好种地建房。俺穷，没牵挂，头场水一落下去，俺就辞家逃荒了。走时有俺婆母，刘焕俺俩，二弟刘货夫妻俩，还有俺女儿小恩，儿子德安，一共7口人。

黄泛区几十里宽，北边是日本人占着，南边还是国民党管着。俺过了贾鲁河往东南，要饭走在西华县，在沟刘村的庙里落脚。刘焕弟兄俩靠扛活挣钱，俺妯娌俩领着孩子要饭，婆母年老，在庙里看摊。生活是挣来，要来，就吃；挣不来，要不来，就饿着。遇到天阴下雨，一家人都得挨饿。这时候，俺又生了个女儿。好户家女人坐月子，吃细米、白面、鸡蛋，逃荒要饭坐月子，连剩馍剩饭都吃不饱。

后来日子越来越难过，当地人都没啥吃，要饭就更难了。刘焕弟兄俩找不到活干，挣不来钱，俺妯娌俩又要不到饭，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一两天揭不开锅，老老小小都饿得皮包骨头，干柴似的。我没饭吃，就断了奶水。小妮饿得直哭，吸不到嘴里奶，她就狠狠地咬奶头，俺看孩子可怜，也顾不得疼，就让她噙着。孩子没撑多少天，就饿死了，临死的时候，嘴里还噙着干奶头。

一家7口人勉强熬过阴历年，地里的野菜挖净了，远近的树皮也剥光了，俺就领着德安偷偷下地掐麦苗吃。掐人家地里的麦苗不能让人家看见，让人家看见了不光要挨骂，说不定还要挨打。俺婆母饿得不能动，连哼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孩子哭着喊饿，跟俺要馍吃。眼看一家人活不下去，刘焕就暗地里跟俺俩商量，给小恩找个婆家，送去当童养媳。

婆家来领人那天，小恩头扎到我怀里，哭得死去活来。德安也哭着不叫姐走，孩子的奶奶也躺在那里暗自落泪。刘焕蹲在墙根里，低着头，直叹气。儿是娘的连心肉，眼看孩子要被人带走，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见面，俺心里好像钢刀扎。俺忍不住把小恩紧紧搂在怀里，失声痛哭。来带小恩的人在一旁看了，也跟着擦泪。

送走了小恩，一家人又大哭了一场。俺一连几天就像掉了魂似的，干事拿东忘西，小恩的影子老在俺眼前晃来晃去。

送走小恩没多少天，记得是阴历二月二十四，俺那受罪的婆母娘饿死了。老人

家直到死也没喝上一口面汤。

婆母娘死后四五天，当地的保长就上门了，说是要派刘焕的工，叫他去打黄河堤（黄水泛滥后的新河道）。俺说：“他已是被病饿折磨得要死的人了，哪还有力气去干打堤的活？”保长说：“咱村里十家有八家都是这情况。你们都不去，俺跟上面咋交代？去吧，上面这次派工打堤是以工代赈，一天能挣几角钱，还给粮食。”

刘焕听说给钱又给粮食，就对俺说：“俺去，俺这身子骨能撑一天就干一天，能挣一斤粮食给你和德安吃两顿面糊糊也是好的，这树皮草根再吃下去，俺一家又得死人。”

刘焕就这样拖着病体出了门。

自刘焕走后，俺就揪着心，他这两个月连病加饿，先是浑身肿，后来肿消了，就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干一点轻活都气喘，哪能抬土打堤，刘焕再有个好歹，俺娘俩往后还靠谁呢？

俺牵肠挂肚地过了一天，第二天就有人捎信给俺，说刘焕一天走了30多里地，走到道陵岗一头栽倒在地，就起不来了。

俺得到信就走，恨不得一步迈到道陵岗，见见俺的亲人。谁料想俺赶到地点，刘焕已死去多时，尸首都硬了。俺只觉眼前一片发黑，当时就瘫倒在地上。

刘焕和俺结婚12年，俺夫妻有福同享，有苦同吃，要饭要来半瓢稀粥也要分着喝，可说是相依为命。刘焕一死，撇下俺孤儿寡母，逃荒没人担行李，要饭没人打狗，俺越想越觉得往后的日子没法过，越哭越恸，就想自尽算了。

在一旁的好心人看俺哭得可怜，又要自尽，就劝俺说：“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啊，你死了，孩子咋办咧？”他们叫两个妇女看着俺，其他人拿来一捆高粱秆，把俺丈夫的尸体卷埋了。

俺丈夫和俺婆母就这样做了异乡鬼。

俺丈夫死后不久，二弟刘货又饿死了。弟妹为了活下去，只好改嫁。俺妯娌俩抱头痛哭一场分了手。弟妹一走，俺要饭连个伴也没有了。

后来俺那送给人当童养媳的女儿小恩也饿死了。

小恩的婆家也很穷，孩子到她家照样挨饿。一天夜里，俺已经睡下，听见庙门口有人喊了一声：“妈，俺回来啦。”声音虽小，可俺一听就知是小恩。俺出庙门一看，见小恩倒在地上，忙扶她到庙里躺下。俺问小恩：“天这么黑，你咋回来啦？”小恩说：“俺怕饿死，不能见妈！俺饿，有馍没，给俺一块。”

俺一听孩子喊饿，向俺要馍，心比刀扎得还难受。俺哭着对孩子说：“你奶、你爹、你叔都饿死了，妈也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哪有馍啊！好闺女，睡吧。天明了妈去给你要。”

俺女儿虽小，可很懂事，听俺这么说，就再没吭声。

俺以为孩子真的睡着了，心想女儿饿成这样，到天明俺说啥也得想法子给孩子要块馍来。第二天一早，俺看小恩睡着，就没喊她。俺到村里求爷爷告奶奶，要了一碗糠皮粥和一块榆皮面馍馍，端回庙里，喊小恩和德安起来吃。德安醒了，可小恩一直没应，俺上前一看，见孩子已经死了！

德安不懂事，以为他姐还没醒，扑上去，抓住她的手直摇，说：“俺姐，俺姐呀，妈给你端吃的来啦，你快醒醒呀。”

俺懵了，呆了，瘫坐在墙根下，没哭，也没眼泪，憋了半天，才嚎了一声：“德安，别唤了，你姐她醒不过来了！”喊完俺才哭出声来。俺一边哭，一边喊：“俺的个孩子呀，你妈没本事，没馍给你吃，你妈没本事呀——”

德安听说他姐死了，哇的一声，扑在小恩身上大哭起来。俺娘俩高一声，低一声哭喊着，可惜的小恩，在草铺上躺着，一声不吭，就像睡着了似的。

俺可怜的孩子，从今以后，她再也不会向俺要馍吃了。

俺从家逃荒出来时7口人，到西华县后又生了1口，共8口。一年多的时间饿死了5口，被迫改嫁1口，只剩下俺和德安娘俩了。为了把孩子拉扯大，俺咬紧牙关，忍饥受冻，总算熬过了那个可怕的年头。

灾荒虽过，苦难却没有头。为了活下去，后来俺又领着德安逃到遂平县的沙河店。一天，俺德安在要饭路上拾了几棵豆子，一个财主硬说德安偷他家地里的，抓住德安，抡起青皮秫秸就打。俺跪在地上苦苦求情，财主才把德安放了。

俺在遂平过不下去，又回西华。西华待不下去，又去西平投靠俺妹妹。妹妹家也靠要饭过日子。后来，俺娘俩同妹妹家一起要饭，直到1947年打住了黄河口，俺才领着德安回到尉氏段庄老家。



## 屡睹人间惨剧，备尝苦辣酸辛

中牟县刘集乡徐庄村农民齐贯岭（1991年口述记录）：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五月间，国民党军队扒开赵口、花园口大堤，俺村被淹，收下的麦子刚进场就被大水冲走。眼看就要饿死人，俺只好带着一家人出外逃荒。

那时候，新黄河南北横滚，水深流急，西岸驻着国民党军队，为防日军西犯，发现船只，就用机枪扫射。因此过河都是夜间偷渡。当时，三王村是个渡船靠岸的“私口”。这里有个叫马凤妮的领着3个伙计撑了3只小鹰船来往摆渡。在洪水里赶浪尖行舟，稍不小心，就会船沉人亡。人们都把这种船叫“送命托盘”。

这一天，河口上已聚集了几百个逃荒的人，等着过河。当俺把老婆、孩子换上船，回头推小车时，人们一哄而上，船就开了。俺只好乘另一条船追趕亲人。

船到河心，浪不断打进船舱，小船像片树叶似的在水里飘摇，船上的人吓得直叫唤，可谁也不敢乱动。船随浪行，一忽儿抛上浪尖，一忽儿摔下浪底，大伙只好闭上两眼，听天由命。过了一会儿，船家喊：“大洪已过，就要到岸了！下船后都往东南方向跑，见到村庄再转正南走。要不碰上河防兵就遭殃了。俺也是为了一张嘴，才在这里玩命的。”大伙听了，才算舒了一口气。

俺下了船，推着小车，照着船家指的方向跑。幸巧在十里铺找到了她们娘俩。可咱们还没顾上搭话，就听黑地里“砰、砰”两声枪响。俺慌忙用小车推着她娘俩向南跑去。

第二天日头偏西后，俺行到滹沱张北地的沙林里。三条大汉突然从路旁树丛里钻出来，堵住俺的去路，一个大喝：“站住！带私货没有？”一个手里拿根柳棍，另一个掂着短枪，气势汹汹地对着俺。俺老婆吓得直哆嗦，哀告说：“大哥，俺们是逃难的呀……”掂枪的向旁边两个使了个眼色说：“逃难的也不行，搜！”

一个矮个子上前搜了俺的身，又到小车上翻腾了一阵。他见车上只有两条破被褥和一袋馍，还有一个大黑瓦罐，十分丧气，骂道：“妈的，穷光蛋，滚吧！”

当天晚上，俺一家就住在三官庙西边的姬庄。

俺们一连走了8天，才赶到漯河。那天晚上，俺买了一碗牛肉丸子，卖丸子的还让俺添汤泡馍。这是俺一家人8天来吃的头一顿饱饭。

俺原本是想到漯河投亲戚的，可找了三天，也没找见亲戚家。俺正发愁，幸巧碰上个卖菜的，一听是家乡口音，俺俩一聊，才知他姓张叫德喜，尉氏县卧岗人，也是逃水出来的。当晚，俺就和他住在一起。后来俺在张德喜的关照下，找了个地

方，摆下摊子，重操旧业，卖起了丸子汤。

俺卖丸子汤期间，有个30来岁的阔少爷，穿大衫，戴礼帽，每次喝罢汤总是一抹嘴说：“记账！”一连几天如此。一天，他又来喝汤，俺先开腔：“先生，俺是小本生意，您给添个本钱吧。”他眼一翻，问：“多少？”俺说：“两块五，零头不算，给两块算啦。”他手一伸，说：“再拿过来两块五，欠你五块。”俺待在那里，他仍伸着手，眯缝着眼，手上一下抖，吼道：“拿来呀！”俺不敢动，也不敢吭。他上前一窜，朝着俺脸上“啪啪”打了两耳光。边打边说：“给，给你两耳光！”打得俺鼻口蹿血。他打过俺，喘着粗气骂道：“妈的，给你钱？呸，给你个烤红薯暖暖手哩！”说罢扬长而去。

这样的事何止一桩？有些当地人，欺负俺是外乡客，除了明敲硬诈，有的还向俺汤坛里偷撒煤渣，扔死苍蝇……弄得俺生意没法做，只好停业。那时，穷苦人逃荒在外，想谋个活路，可万难啦！

俺在漯河日子一长，思乡梦家就成了心病。这年农历二月间，有十多位乡亲远行百余里来找俺，想找个活路。晚上俺七拼八凑给大伙儿熬了一锅粥喝。吃完了饭，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抵着膝头唉声叹气，坐了一夜。他们看俺日子过得也艰难，第二天一大早，都推起小车要走。俺十分羞愧，恳求说：“乡亲们既来找俺，咱就有福同享，有罪同受，要死咱死到一块。”乡亲中有位叫贺老铁的老人，含着泪对俺说：“贯岭弟，你的心俺知道，咱出来逃难，就是为了活下去，要是住在一起等死，还不如咱们各奔前程。碰上好运气，还能保住几口人的命。”

咱们就这样洒泪而别。

咱们分别后，没出一个月，就有人来告诉俺，贺老铁老两口饿死了。贺老铁的女儿玉湘，为了买两口薄木棺材埋葬爹妈，自卖自身，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卖身葬父母，这在逃难的穷苦人中是常有的事。俺去埋葬了贺老铁两口，临走一再吩咐玉湘：“孩子，逢年过节，你再没钱，也要在大街上拾几张烟卷纸，去到你爹娘坟头上敬一敬老人在天之灵啊！”玉湘哭着对俺说：“俺叔，你的话俺记住了。俺只要不死，说啥也不会忘了给俺爹妈上坟的。”玉湘哭得一脸泪水，两眼肿得像红杏似的，俺看着真心疼。

事隔三天，十二三岁的小进才又哭喊着找上门来——他父母饿死在漯河城隍庙里啦！进才的哥哥、叔叔都卖了壮丁，他爹妈死了，连抬下地的人也没有。俺只好请了两个人跟俺一起，去把他父母抬埋在乱坟地里。俺看进才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好可怜，就把他收养下来，从此俺家又多了一张嘴，日子过得更艰难啦。

四月初一，俺全家人正在吃晚饭，一个从不相识的20来岁的妇女来到俺家，一进门就问：“你是中牟县徐庄的齐大叔吧？”俺应：“是的。”俺话音一落，她就坐

在地上哭了起来。俺说：“你有啥事好好跟俺说，哭啥哩？”她哭了一会儿，向俺说起了她的遭遇。

她娘家是咱县孔庄人，嫁给一个姓刘的为妻，生了个孩子叫“中央”。黄河开口后，丈夫领着妻儿逃荒来到漯河。由于一时找不到生活门路，这个男人生了歹念，暗自把老婆孩子卖给了一个丧妻的裁缝，自己拿上钱逃走了。这个裁缝怕带来的孩子拖累自己，就把中央偷偷卖给一个打漯河路过的生意人。孩子被人带走的时候，娘俩也没能见上一面。这个年轻媳妇被丈夫转卖他人，孩子又被人家偷偷卖掉，觉得自己命苦，只想找个家乡人诉诉苦衷，就找到了俺。打那以后，她把俺认做干爹，做了俺的干闺女。

俺逃黄水在漯河度过了13个春秋，直到解放后才回家乡，那些年真是尝尽了辛酸苦辣。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故事，几本书也写不完，古语云：“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以上三户人家的遭遇，读者可以大致想见黄泛区千百万背井离乡的灾民，挣扎在苦难深渊的悲惨情景。

黄水泛滥，豫、皖、苏三省被淹没耕地面积达数十万公顷，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黄水来时，一片汪洋，灾区百姓眼巴巴等着黄水退去，好安种赖以活命的庄稼。岂料等到黄水退去之后，大片的土地或被流沙覆盖，或被黄水浸渗，变成了白茫茫一片的盐碱地。而变成了新河道的地方，土地则永远陆沉于黄水之中。

由于黄水泛滥，1938年秋季，泛区大部分土地颗粒无收。严冬随之而来，未死于洪水而株守家园的百姓，开始成千上万地死于冻馁。

黄水泛滥，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土地淹没，粮食无收，百姓逃荒或饿死；百姓逃荒饿死，土地荒芜；土地荒芜，粮食无收，更多的百姓逃荒或饿死……

花园口掘堤，遗患连年。

黄泛区人民，仿佛坠入了永难脱离的苦海。

1941~1942年间，受黄泛之害，损失最为惨重的河南省又遭受特大旱灾，紧接着又是史所罕见的蝗灾，而在一连两季严重欠收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仍令当地驻军“就地征粮”。天灾人祸严相威逼，灾区已不分水域和陆地，千百万哀哀无告的灾民可谓雪后逢霜，逃荒无路，要饭无门，像蝼蚁一般无人救助，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